

搜尋



首頁 >>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 何明修：從悲情到共生——年輕人與二二八事件

何明修：從悲情到共生——年輕人與二二八事件

作者：何明修

2015/02/06

關鍵字： 二二八 共生音樂節 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太陽花 公民不服從 轉型正義 民主



photo credit : flickr@tenz1225,CC BY-SA 2.0

過去兩年來，有一群年輕朋友一直努力舉辦二二八[共生音樂節](#)。除了原先本土社團支持，今年他們更決定採取[群眾募款](#)方式，來號召更多人來響應。為什麼台灣的年輕人開始關心二二八？事實上，如果你去問現在的大學生，什麼是二二八？他們第一個想到的是不用上課的國定假日。對於大部分的大學生而言，二二八事件就是很久以前發生在大稻埕的緝煙血案（事實上，那是發生在二二七），他們的¹理解就是停留高中教科書的描述。如果你再多問一些，他們對二二八的印象大概不會

是正面：那就是一樁不光彩的歷史慘案，最好能夠有點遺忘；再多談，就是撕裂族群，激化政治對立。

事實上，二二八在當代台灣的意義不應該是如此，這也是籌辦共生音樂節這群青年所試圖扭轉的。

從台灣可以公開談論二二八開始，這個議題是「轉型正義」運動的形態出現，儘管這個詞彙在當時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當威權統治的陰霾開始鬆動，暗夜偷偷流淚的人們終於有機會講出他們的傷痛，他們祈求知道歷史的真相，也要求蒙受的不義獲得平反。在1987年，也就是事件之後的整整四十週年，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他們要求訂定和平日、成立史料紀念館、釋放政治犯、追究刑責、政府道歉、認同本土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這場舊政權的大規模人權侵害首度成為公共議題時，主事者所設定的基調是未來的社會和解、而不只是針對過去的清算，這也是為何「和平日」的訴求成為最顯明的框架。

然而，這樣前瞻性定位卻遇到了政治上的阻礙。只要是舊政權的加害者仍舊掌權，他們就盡一切力量來阻撓歷史真相的浮現，甚至持續深化加諸在受害者身上的傷痕與烙印。在1988年，行政院長首度在國會被質詢關於二二八事件，當時俞國華堅持主張政府沒有過錯，因為就如同滿清入關後，也沒有被所殺害的漢人道歉。儘管官方版本的調查報告在1992年就出爐，但是大部分的檔案文獻卻是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才被公諸於世。在1995年，政府終於通過了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專法，但是卻堅持以「補償」、而非「賠償」的名義來安撫受害者家屬，企圖規避政治責任的追究。

如此一來，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者不得不特意強調受害者的無辜，來彰顯舊政權的殘暴與不義。最常見的意象就是許多的台灣人領袖死不瞑目，含冤的英靈包括了一整個世代最優秀的菁英，例如政治領袖王添灯、律師湯德章、金融家陳炘、哲學家林茂生、畫家陳澄波等等。也由於二二八事件長期以來被當成政治禁忌，等到受害家屬終於有機會討回公道時，許多人已經垂垂老矣。因此，從年輕世代來看，反平二二八似乎不過是歐吉桑、歐巴桑去算國民黨舊帳，而與他們無關。的確，1947年之後的台灣，少了這些傑出人材，的確是更形黯淡失色。

但是這只是真實二二八事件一部分，而不是全貌。當王添灯、湯德章、陳澄波等人參與各地的處理委員會，試圖與當局協商，爭取台灣人的自治之同時，各地也有許多年輕人挺身而出，用更直接的方式來，來迫使國民黨讓步。這些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或許是高校生、大學生，或是從海外返台的軍人，他們參與了台中、虎尾、嘉義、高雄等各地的起義活動。在那段混亂的日子裏，這些年輕人的參與曾維持一定程度的治安，避免流血衝突的擴大。甚至等到國民黨高層決定用軍事鎮壓來消解台灣人民的政治渴望之後，真正敢與登台鎮壓的二十一師交鋒、參與埔里烏牛欄之役也是來自台中的學生軍，而他們的指揮官黃金島當初也不過是二十一歲的年輕人，而當被號稱為「歐巴桑」的謝雪紅也還沒有年過四十歲。

二二八事件其實不只是受苦受難的歷史敘事，另一個比較少被看到的面向即是，許多年輕人在家園有難時，願意挺身而出。這聽起來像是國民黨所宣傳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與青年節，同樣是有拋頭顱、灑熱血的年輕人熱情，但是其中的差別十分巨大。中華民國的肇建對於當時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是二二八事件的苦難收場卻徹底形塑了戰後的台灣。

如果從青年的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那麼比較貼近的類比倒不是發生於1911年的廣州起義，而是去年的太陽花運動。同樣是當國家發生了巨大的災難時，許多年輕人願意站出來捍衛家園，「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口號其實一樣是講得通的。就如同黑箱作業的服貿協定激發了多青年的憤慨，許多人放棄了學業、辭了工作，1947年的台灣年輕人所做的是一樣的抉擇。不只過，很幸運地，在經歷了民主化的洗禮，台灣青年抵抗不義不再需要拿起槍桿子，而是可以採用符合憲政原理的公民不服從。因此，另一個二二八事件容易被忽略的面向，即是那曾是青年理想主義的極致表現，不只是後來年長者的歷史怨懟。

因此，如果你覺得談二二八，會引發政治對立，這肯定是錯誤的看法。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之前，都曾認定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只不過，所謂「民反」不應該只是有消極意義的，畢竟那時的台灣人所追求的不外乎是貨真價實的民主自治，這個主張也是目前的台灣人民共同願望，不分藍綠。

再且，在現今的脈絡再談二二八，也早就超越了族群衝突、省籍隔離的格局。首先，在1947年之前，那些欺壓台灣人民的政府官員，許多人後來早就離開台灣，他們的惡形惡狀不應該成為所謂的「外省人原罪」。另一方面，所謂的「外省人」其實是是一個籠統的稱號，含雜太多因為不同的歷史脈絡裏來台灣的大陸人。舉例而言，1955年之後才來遷台的「太陳人」，根本沒有享受到國民黨的蔭蔽。對於他們而言，被迫遷徙的苦難不會比台灣人的二二八更為沈重。

更重要的是，在現今的脈絡，再來談省籍與族群的分隔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了。許多年輕人願意投身於眷村保存、反對拆除當初許多外省遷民登岸的基隆碼頭運動、將台北市長選票投給趙衍慶，他們根本不是出身於外省家庭。同樣地，去年許多投身於太陽花運動的青年，也有不少是來自於深藍背景，結果他們不得不從事一些「自己的爸媽自己救」的活動。

回頭來講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固然是台灣人民的共同的沈重負擔，但是也不應該只定位於悲情與冤屈，或者只是關於平反與算舊帳。這當然是轉型正義運動所乏追求的重要訴求，也應是任何台灣執政者所誠心面對的，畢竟他們所掌控的國家機器就是當初釀成悲劇的禍首。

從悲情到共生、從怨恨到和解，讓悲劇不只不會重演，甚至成爲一個政治社群對於青年理想主義的共同肯定，這或許是不幸的二二八事件能對於當前台灣最重要的意義。希望透過共生音樂節等類似

的活動，我們不只是悼念那些英年早逝的先賢先烈，感嘆他們的含冤受害，而是更一步去頌揚那股爭取民主自治的熱血情操。

瀏覽次數：11769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讚 1,952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讚的人。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何明修，1973年出生於台北西門町，目前任教於台大社會系。走上社會學這條路，原是由受到艱澀、但充滿想像力的抽象理論啟發；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覺得社會學的趣味，在於理解人生百態，解答人間形形色色的苦難。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

	2015/08/08	1,641
	【讀者投書】李雨綸：比反課綱微調更有力量的行爲	
	2015/08/06	2,182
	何明修：中國被馴化的公民社會	
	2015/08/03	4,328
	【讀者投書】張靜芸：從反課綱抗爭看國家認同	
	2015/08/01	7,506
	何明修：從高中生反課綱調整看中國文化在台灣的黃昏	
	2015/07/31	38,304
	黃丞儀：進入正當性危機的時代	

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